



Simone de Beauvoir



第二卷·盛年·下

西蒙·波娃回忆录



女子学院 0035569

066497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波娃回忆录

第二卷·下

盛 年

陈欣章

陈际阳

谭 健

译

校译：陈际阳 谭 健

022.53/63

(苏)新登字007号

盛 年——西蒙·波娃回忆录(二)

译 者：陈欣章 陈际阳 谭 健

校 译：陈际阳 谭 健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2.875 插页 8

字数：572,000 199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42-2/I·325

定 价：14.00元 （上，下全两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当你着手写一部宏篇巨制而又精心构思的作品时，令人烦恼的是，这部作品早在收笔之前，你就无法与它齐头并进了，此时此地发生的事并不等于它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十月，我着手创作《女宾客》，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完成了这部作品。在事件和人物相互变更的定稿时期，最后一章引导我去修改开头的一章，而每一个故事的情节又根据整体的叙述进行修改。这些修改，无论怎样，为的是满足作品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反映我个人的发展。我从真实生活中所借用的任何事实纯粹都是无关紧要的。小说从构思到完成，表达的是我留在身后的已逝岁月。恰恰是由于生活中不断更新的我与我在作品中描写的我之间的差异，使得我的作品——正如我现在所懂得的——难以用千真万确去衡量。有时一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不能工作。但当我坐下来处理我的手稿时，我的心马上跳回到过去的时代，复活一个已消失的世界。当我仔细审核一页页已经印刷好的作品时，我却看不见我创作这部作品时留下的岁月痕迹——早晨和晚上天空的颜色、那孕育着恐惧和期望的震颤，都已经飘然而去。

但是，当我如此吃力地从寂寞的心情、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停地运转的阳光中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却变成了另一个人。迄今我唯一关心的是丰富我的个人生活，学习将

它付诸文字的艺术。渐渐地我已经放弃了我二十岁时所抱有的“准唯我论”和自主的幻想。虽然我已经承认他人存在的事实，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仍是我和个别几个人的关系。我仍旧极度渴望幸福，然而，历史突然冲击了我，把我冲得七零八落，我醒来后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地球上，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和其他人连结着。我的所有思想和价值都被混淆颠倒了，哪怕是对幸福的追求也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写道：“对我来说，幸福的全部含义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特殊方法，如果世界变到了一个再也不能照这样被认识的程度，那么，幸福也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一九四一年一月，我又写道：“我对于幸福的旧观念，现在看来显得多么目光短浅，它统治了我一生中的整整十年，但我认为，现在我几乎完全摆脱了这种旧观念。”事实上，我又从未完全抛弃过它，以后，当我不再把我的生活看作是一个自发的和自足的设计时，我不得不重新发现我与那个我正已经忘却了的宇宙的联系，我现在准备叙述的正是这一巨变。

第六章

一九三九年初夏，我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头脑里不断萦绕着一个顽固的想法：“它不会降临在我身上，不会有战争。”希特勒决不敢进攻波兰，三方协议将会成功，这个协议一定会扼制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出于这种天真的想法，我继续为夏季的平静度假设想各种方案。原定在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帮助下赴苏联进行考察的计划这时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但是，如果国际形势朝着好的趋向变化，我们可以到葡萄牙去旅行，萨特同意这个想法，但同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非常不妙。为了使我早作思想准备，萨特提醒我：现实是严酷的，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免得到时手足无措。然而，我自己理不出头绪，假如战争这个可怕的怪物真的出现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想，就个人来说，把战争痛苦消解到心灵能承受程度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和个人精力的无价值耗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将只能随机应变，因此，我有意扼制自己的想象。

勒梅尔太太邀请我们八月上旬到她的朱安-勒潘斯别墅去和她一起度假。八月十五日，我背着背包独自一人踏上赴普罗旺斯的旅程。我取道旺图克斯山、吕尔山丘、下阿尔卑斯、凯拉斯河谷以及阿尔卑斯滨海省。这是我所有的远足中最令人兴奋的一次。当时和斯特芬呆在尼斯的费尔南多也想同我

一道旅行几天，我们约好了在皮盖-泰尼埃一起启程，他穿着一双布纹漂亮的轻便鞋。第一天，我们在那延绵的微红色的山丘上欢快地走了八个小时。第二天，我们从纪尧姆到圣艾蒂安-德蒂内的山区又足足跋涉了九个小时。那天晚上，费尔南多由于发烧，颤抖着上床就寝。第二天一早，我便独自一人出去登山探险，当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已决定返回尼斯。我依然独自一人继续上路远足。我从圣维兰出发，经过一个荒无人烟的悬崖，惊动了一群小羚羊，登上了近九千英尺的高处。当我走到离意大利边境较近的地方时，遇到一些巡逻兵，其中当官的疑心重重地两次检查了我的身分证。一天晚上，经过一整天的长途跋涉，我到达了拉尔舍。那天晚上恰巧那支部队也驻扎在拉尔舍，因此连一张床位也找不到。最后，我只好和当地警察的夫人——一位个子矮小，身材匀称的老妇人睡了一夜。当时，我满脑子想着鲜花、野兽、石铺的小路和辽阔的地平线；我为自己拥有健全的器官而欣慰；我一心想打破自己的纪录。

在马赛，我找到了萨特和博斯特。博斯特当时正在休假。他们两人都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德国人已经渗透进但泽；要希特勒放弃他的计划，或是让英国在波兰问题上退让，都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萨特最不希望的是另一次慕尼黑事件，但他对大动员的前景也并不喜欢。我们中午出去到马尔提格去吃浓味炖鱼。阳光洒在鱼网上、洒在鱼网主人那粉饰得鲜艳的船上。我们在水边一块巨大的圆形漂石上坐下，虽然我们大家都感到不舒服，但萨特却若无其事。我们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仰头望着蔚蓝的天空，陷入冥思。难道打瞎了眼、打肿了脸，或者是缺胳膊断腿地从前线回来这几种情况中能分出好坏？巴黎有没有被轰炸的可能？德军会不会使用毒气？两天以后，博斯特离开了我们，我们在马赛又呆了两三天。一天

下午，我们坐在老港的“狼群燃烧器”店外面的人行道上，尼桑溜达过来，胳膊下夹着一只巨大的印度橡胶天鹅。当晚他和他的妻小要乘船去科西嘉岛，与洛朗·卡萨诺瓦会合。行前，我们一起喝了几杯。他神秘而又得意地声称，“三方协议”正处于被批准的过程中。一向沉默寡言的他，这时却以极度欢欣的口吻侃侃而谈。“德国人最终必败！”他肯定地说。他对于形势的看法与《晚报》上发表的那些看法迥然不同，他显然参与了上层的秘密活动，他的乐观情绪使我们内心稍安。我们彼此相互祝愿一番，祝大家的假日过得安宁和愉快。然后，他和我们告辞，胳膊下依然夹着他那只印度橡胶天鹅。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勒梅尔太太的父亲早在这段海岸还是荒无人烟的时候就已建起了名噪一时的索尔别墅。这座别墅四周被一个大花园和一片松树林子包围着，这片松树林子一直延伸至海边，靠近普罗旺斯海滨。我们到外面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吃早饭，边吃边观赏着几只快艇拖拽的滑水橇，橇上的人飞快地掠过海湾那蓝色的水面。一天上午，我们观看了水上障碍滑表演，发现这个表演非常有意思。萨特写作，我阅读。在那段时间，我不太懂得调节工作和娱乐。中午时光，我们一起去海滨，在那儿，萨特教我游泳。我努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但顶多只能游出十多码远。萨特可以游半英里多，但唯一的苦恼是，一旦他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宽阔的水面上畅游，他便相信从海水的深处会跃出一条巨大的章鱼把他拖入水底，结果他就赶紧以自由式快速地游回岸边。我喜欢下午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回到别墅的阴凉处。所有的百叶窗下午都是关着的。我们习惯于吃色拉尼考斯和凉鱼，偶尔也吃一盘大蒜蛋黄酱。这种东西吃后就想睡觉。总有人顺便来吃午饭和晚饭。勒梅尔太太的几个孩子经常带他们的朋友来，而且他们朋友也不少。

马尔戈也呆在“索尔”。他又一次在试唱中失败，还是没能走上唱歌剧的道路。新近的失恋使他感到痛苦，战争的威胁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他开始变得脑袋秃顶、身体肥胖，人也丑陋起来。他的脾气也变得多少有些烦躁不安。他固执地认为，勒梅尔太太、萨特和我在他的背后批评他，因此，他总喜欢偷听我们的对话。一次，他躲在门后被我们撞见，另一次在窗户下面鬼鬼祟祟，又被我们发现。他对此表示抱歉，尽情地大笑，他此时此刻的这种大笑，听上去嘶哑、虚伪。他四处寻找同盟，搞阴谋诡计。家族里一些人相互勾心斗角，我们如同往常一样对他们之间的问题非常感兴趣。我们与勒梅尔太太讨论这些问题，并急切热情地营构假设，批评这批评那。马尔戈习惯于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以此为乐，以便不分青红皂白地蓄意使人烦恼，寻求单纯的快乐。他告诉勒梅尔太太，萨特讲了有关她的各种各样的坏话。这纯属他的捏造。致使勒梅尔太太为此而谴责萨特。这样一来，以前旧的矛盾又再次加深。虽然萨特发起火来经常是毫无恶意的，但我很少看到他在发怒时适可而止。当他大怒的时候，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在这种情况下，他总刻意选择措辞，淋漓尽致地痛斥对手。这时的马尔戈则痛哭流涕。为了解，他带我们和勒梅尔太太去戛纳参观那些“易装癖的馆子”。然而，尽管如此，由于我不工作，实际上对我来说，日子过得相当缓慢，显得无所事事。有时，我甚至觉得，蓝天和碧海美得过分了。同萨特一样，我有一种感觉，水下面潜伏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章鱼，而是某种有毒的东西。这种柔和的阳光是骗人的，整个世界似乎要被突然撕破了。

最后都昭然若揭了，一切被撕破开来。一天早上，我们打开报纸，读到了有关《德苏条约》的新闻。这个消息的到来犹如一个致命的打击。斯大林放纵希特勒随意攻击欧洲，现

在再也不会有任何和平的希望了。正是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首先击中我们的要害；但是，其他的想法也随之而来。虽然我们对苏联国内发展情况持有大量的保留意见，但无论如何，我们一向认为苏联政府的目标是世界革命事业。这个条约最为无情地证实了科莱特·奥德里和托洛茨基分子、以及一切左翼反对派集团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总而言之，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的强权国家，也顽固地寻求自身的私利。斯大林毫不在乎欧洲的无产阶级。迄今为止，在云集着的乌云中，有一束巨大的希望之光一直在闪耀；但是，那天早晨的新闻却将这一线希望扑灭。黑夜笼罩大地，透入我们的骨髓。

萨特和我都想一起单独呆几天，所以我们离开了朱安-勒潘斯。要是径直回到巴黎就毫无意义了，因此，我们踏上去比利牛斯的旅程。当我们与勒梅尔太太，甚至与马尔戈告别的时候，我们感到一阵离别的悲伤和痛苦。在我们再次相聚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朱安至卡尔卡松的火车挤满正在度假又奉命归队的军人。他们自称是饱经风霜的老兵。“我们要不了多久就都会被打死的。”他们说着，一边走进车厢，坐在事先预订好的座位上。我发现卡尔卡松城堡周围堤状的防御土墙十分丑陋，但城里的小街却使我感到愉快。我们坐在一家被遗弃的餐馆院子的凉亭下，喝着白葡萄酒，讨论着战争以及战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一起面临这场灾难。我们乘车旅行，参观附近的小城，在教堂和修道院中流连忘返。到了蒙路易，天下着雨。在那儿，我们见到了第一批战时动员的布告，我们决定启程回巴黎。但在福瓦克斯多呆了一天。在“枪眼”饭店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午饭——冷盆、鲑鱼、扁豆、油煎肝、乳酪和水果，并喝了当地的葡萄酒。萨特告诉我，在《走向自由之路》第三卷中，他

要写布律内怎样出于对《德苏条约》的反感，最后离开共产党，向马蒂厄寻求帮助。他说这是与第一卷描写的境况的倒转。之后，我们沿着一条潺潺流水的清澈小河散步，议论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乡村同它所属的寂静的小镇一样，都不会受到战争的袭扰，我们最终会发现这两个地方一如既往地存在着。这给了我们坚持生存下去的某些勇气。我们认为木已成舟，我们参加这场战争就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若无其事地漫步，试着使自己相信，我们的仪态举止之镇定，我们周围环境之安宁，与我们同样平静的心情是相吻合的。但是，这种故作镇静的姿态并没有持续多久。那天晚上七点三十分，我踏上去图卢兹的列车，在那里，我们本应马上换乘去巴黎的直达快车。然而，直达快车却拥挤不堪，我们在这个黑暗而拥挤的车站足足停留了两个半小时。车站只有几盏微弱的紫色灯。黑暗和那骚动不安的人群预示着一种社会大变动的来临；我也不再回避事实，它已穿透了我的骨髓。又一辆快车进站了，人群如潮水般向车厢涌去，动作敏捷，连推带挤，我们设法找到了两个靠窗口的座位。

由于已是八月，巴黎的一切都是关闭着的，包括餐馆、剧院、商场等等。我们的朋友至今还没有一个回来。奥尔加仍在伯泽维勒，博斯特被困于亚眠，帕尼耶和他夫人一家呆在乡下，我妹妹和我父亲一起呆在拉格里雷尔，尼桑还在科西嘉岛。我们特别想和尼桑谈谈；我们无法理解他的判断被证实是如此的不准确。他曾经讲过《晚报》上那些他不喜欢的重要人物的情况；但是，这种敌意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已被抛弃了吗？他对新闻的反应又是如何呢？无论是在他的私生活中，还是在好战的公开生活中，他都不是那种甘愿吞苦果的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意味着与这个条约是直接冲突的。

我们常常想起他，共产主义者的命运总的来说，在我们心中牵挂甚多。一些较激进的共产党员被捕了，《人道报》和《晚报》都遭到查禁。这是一种荒谬的、令人气愤的状况，因为进攻法西斯的先锋正是法国共产党。也有许多其他的事情使我感到烦恼，其中有的是从报纸上读来的，有的是从咖啡馆里听来的。新闻界一直谴责所谓的“第五纵队”，这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它确实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危险。同样，我们也猜想，这也许将作为爆发歇斯底里间谍战的借口吧。其程度要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更为严重。我们从空气中所嗅到的混合着吹牛、懦弱、失望和痛苦的气息，使我们感到异常不安。

时间过得慢极了。我们无事可做，我也无所事事，只是闲荡在空旷的街头，不放过日报的每一版。晚上，我们去电影院，观看美国的最新电影。其中有福特的代表作《公共马车》。这部片子用现代的习惯语言唤醒了我们对旧式西部片所喜爱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解脱；我们从礼堂出来，又出现在香榭丽舍，并未错过深夜最末一版的《巴黎晚报》。每天晚上当我们睡下的时候，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明天将发生什么？”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同样极度痛苦烦恼的心境之中。为什么我们会处于这样的境况？我们刚刚三十岁出头，我们的生活才开始有点模样，然而现在这一存在却被无情地从我们手里夺走了。我们还能将其挽回吗？即使能够挽回，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在福瓦克斯附近的那个平静的下午，仅仅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暂息而已；但是我们非常喜爱的东西也太多，我们却不能像喜爱这些东西那样轻而易举地放弃它们。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心底都保持着他的警惕和他的内心矛盾而不与人交流，但没有一个人会被他人表面上的平静所欺骗。我记得萨特在服兵

役期间爆发的狂怒的脾气，他非常憎恶那种无用的纪律以及纯粹的浪费时间。今天，正相反，他抑制自己不发任何脾气，甚至不表露任何痛苦的表情。然而，我知道虽然他比别人更有自我控制能力，但是他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服从“理智之年的绝对需要”，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他接受了忍痛入伍的需要，而毫无怨言。但是，在他的内心中，这已接近了忍耐的极限。

我们深信不疑，战争已迫在眉睫。法国驻柏林的记者们声称，希特勒于星期五宣布了《德苏条约》后，准备星期六早晨五点钟对波兰实施进攻，但出于某种原因而失去这次进攻的机会。这也是他为什么要把亨德森召去贝希特斯加登的原因所在。也许，他将决定把意大利作为调解人与波兰政府磋商。萨特对于这类谣传并没有当一回事。另一方面，他同其他人一样，确信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民主终将战胜这场战争。报纸回忆起了沙赫特的评语：“在危急时刻，一个人可以用定量供给食品的方法结束一场战争，但却永远不能凭此发动一场战争。”德国缺乏食品、钢铁、汽油，确实什么都缺乏。德国大众并不希望使自己灭亡，他们承受不了一场战争。德意志帝国必将崩溃瓦解。从这一点上来看，这场战争开始有了点意义。我们在“圆顶”见到了费尔南多，在“弗洛”倾听一些亲共产党的议论。如果苏联放纵德国随意进行这场战争的话，他们肯定地说，那是苏联政府正在期待着一场世界革命。这种为条约辩护的理由，在我们看来，仅仅是空谈而已。但是，至少我们希望法西斯的破灭能够给法国和全欧洲带来社会主义的高潮。这就是萨特为什么没有反抗自己命运的原因，虽然他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以获得这一顺从的基础。

八月的下半月，我遇见了梅隆-庞蒂，我向他表明了我们目前的态度，即考虑到所有的情况，这是一种了结众多的

令人讨厌的事物的可以接受的方法。他用带有讥讽的口吻问我，为什么现在我这样平静地就接受了它，而仅仅在一年以前，还对这种态度深恶痛绝。我想，使他感到好笑的是我那用以捍卫崭新信念的激情；但是，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我的这种转变几乎与其他人的转变没有什么区别。在过去的一年中，战争的概念逐渐影响着在慕尼黑危机时期还在相信可以用绥靖方式抵制这场战争的人中的大多数。如果为我自己辩护的话，我接受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深知这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为了保持我内心的平静，我决定迫使自己屈从命运，而不与命运作对。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一日，由于我还可以保持这种心态，因此，我极力恪守笛卡尔的箴言。此外，我内心的实际上的平静远比我佯装出来的要少。我多少有些担心，但不是为自己担心，我脑海里从未闪现过逃离巴黎的念头。我所担心的正是萨特。他向我保证说，他会留在机场或其他什么场所的后部，害怕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危险，不如说是无聊。但是，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尽管如此，我俩还为博斯特担忧。好像炮灰只有那些二等兵，而博斯特年仅二十一岁。人们说，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也许如此。我们都希望事先就知道这场战争怎样爆发以及战争爆发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只要我们还在一起，一同交谈，我们的好奇心加上一种极度的兴奋使我们超脱了我们即将离别的痛苦。

然而，一天早晨，我们分别了。正是从这以后，我处于孤独之中，便开始写日记。这些日记，在我看来，要比我除此之外所作的任何叙述都更加生动和准确。因此，我把它们奉献给读者，仅仅省去那些令人讨厌或过于亲密的细节以及那些冗长的重复字句。

九 月 一 日

上午十点，在未作任何评论的情况下，报纸印发了希特勒的要求。报纸没过分渲染这条消息给人的不安感，但也没有人再抱有一线希望。我到了“圆顶”，店里乱七八糟。那里的人并不多。一有人要咖啡，侍者就宣布道：“他们已经对波兰宣战了！”店里的一位顾客，手里拿了一份《巴黎午报》报。其他人都向他拥去，还有一些人围着附近的一个报摊，但《巴黎午报》还没有来。我起身回旅馆。大街上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快乐。沿着杜梅娜大街有一两个人拿着《巴黎午报》，过路的人要他们停下来给看一看报纸上的标题。我找萨特，想和他一起去帕西看看他的父母，我在地铁下面的维也达克特咖啡店等他。帕西凄凉不堪，街上没有行人，沿着码头是望不到边际的汽车。车上塞满了行李和孩子，甚至还有摩托车和轻便二轮马车。我无法思考，显然是疲劳之至。萨特回来了，显然已经做过动员了，报上宣布战争明天开始，多多少少还给我们一点儿喘息的机会。回到旅馆，从地下室搜出长形帆布用具袋和军靴。萨特担心不能及时赶到集合中心，就叫了辆出租汽车把我们送到靠近小教堂门的一个叫埃贝尔的小广场。小广场上空荡荡的。广场中央竖立着一个写着“第四集合中心”的标语牌，旁边站着两个警察。靠墙竖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一个有红、白、蓝条纹相衬的标语上面写着“紧急呼吁”，它是专门写给巴黎人的。这是一个内容十分简洁的动员令，从九月二日凌晨一点开始施行。萨特走向警察，给他们看了动员令，他必须去南锡报到。“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可以在凌晨一点钟赶到，”这个警察说，“但是，别指望我们为你作一个特殊旅行的安排。”我们回到“弗洛”，索尼娅和阿涅斯·卡普里也在那里。索尼娅显得非

常漂亮，头发用一块红色丝手帕系着。阿涅斯十分活泼，戴了一顶牧羊女帽，系了一条宽大的白丝带。一位面容苍白的妇女啜泣着。一位侍者注视着这一切。好像真正的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一样。但人们看上去仍然是快乐的。尽管我已经放弃任何思考，但是头仍然疼痛。好看的月亮从圣日耳曼-德普雷广场上升起，使它看上去就像农村的教堂。似乎到处都隐藏着什么东西，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感。你不可能预知任何事情，不可能想象将来的情景，也不可能抓住任何形势的关键。

尽管我疲劳至极，夜晚我还是惊恐得厉害。月光在我的房间流泻，我难以入睡。突然，传来一阵大叫，我走到窗前。这是一位妇女在哭喊，人们聚集在一起，路边响着得得的脚步声，手电光来回闪着。这时，我进入了梦乡。

九 月 二 日

指针已过了凌晨三点，我们下了楼朝着“圆顶”的方向走去。深夜的空气非常柔和。“圆顶”和“圆亭”都笼罩在微弱的灯光之中，一队队的士兵使“圆顶”喧闹起来了。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两个妓女正双臂搂抱着两个坐着的军官。其中一个妓女还唱着，好像这就是她的天性。军官们则对此并不在意。从里面传来阵阵大喊大笑。我们叫了辆出租车，穿过那空旷、潮湿的深夜，朝埃贝尔广场驰去。在月光的沐浴下，我们找到了这个广场，但除了两个警察，空无一人，就像卡夫卡小说描写的一样。萨特的决定性行为看上去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自愿的；然而服从硬性的命令，以及自我强迫约束，这一过程又完全与人类本性相悖。警察客气地迎接了他，但神情却很冷淡。“去东方车站，”他们告诉他，仿佛是对一个疯子讲话。我们过了大铁桥，跨过铁轨，天空变红了，现出一种可爱的

景观。车站是荒凉的，六点四十分有一班车，但我们决定，萨特乘七点五十分的那一趟。我们坐在咖啡店的外面，萨特反复地说着，他没有任何危险，他搞的是气象。我们穿过栅栏，在车站上又谈了一阵子，然后他走了。我走回蒙巴纳斯。这是一个极好的秋天早晨，沿着塞巴斯托波尔大街，飘来阵阵清新的胡萝卜和卷心菜的香味。

下午五点，我从电影院出来，空气沉闷，街上异常的安静。《不妥协》暗示着某种不可详说的外交行动。据说，波兰正在抵抗，德国正不知所措，这让人在一瞬间产生了一点凄然的希望，可这种希望其实比赤裸裸的无望更叫人难受。在歌剧院大街，人们排队领取防毒面具。在蒙巴纳斯大街书店，有一个用手写体写的布告立在橱窗里：“有儿子在一九一四年被征召服役的法国家庭响应第九天的大动员。”

我去看费尔南多，他带着一脸愁容接待了我。“爱伦堡快不行了，”他说，“这没使你心碎吧？”因为《德苏条约》，爱伦堡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甚至还动过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啊！这使我完全呆了。我们去了蒙巴纳斯大街的布雷顿煎饼店，灯火管制的大街上一片漆黑，我们只能看见对面墙上一个写着“隐蔽处”的大幅指示牌和几个在街上闲逛的妓女，以及一两盏蓝色的路灯。这家煎饼店供应不足，没有面包，也没有面粉。我仅吃了一点点。今晚咖啡店十一点就关门，而夜总会根本就不开门。一想到要回到我自己的房子，我就难以忍受。所以我去了费尔南多的住所，睡在楼下的长沙发椅上，后来我又铺了一条被单，好久都无法入睡，但最后总算睡着了。

九 月 三 日

八点半醒来，天正下着雨。我第一个想法是：“一切都真